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苏海舟 著

“破茧之初”：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 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

POJIANZHICHU:

1978NIAN QIANHOU ZHONGGUO NONGCUN YU
NONGMIN DE YUANCHU ZHUANGTAI JI DIQU CHAYI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破茧之初”：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
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

POJIANZHICHU:

1978NIAN QIANHOU ZHONGGUO NONGCUN YU
NONGMIN DE YUANCHU ZHUANGTAI JI DIQU CHAYI

苏海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茧之初”: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苏海舟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98-0857-3

I. ①破… II. ①苏…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027 号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0

网址:www.dscbs.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厂

开本:169mm×239mm 1/16

字数:225千字

印张:16.5

版次: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857-3

定 价:32.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丛书序言

2002年底教育部批准的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之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目前的这套丛书即是这一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所以言其新，是因大致上说来它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新世纪到来后的事情。学术发展学术流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变迁，或者说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动魄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变革和戏剧性变化。其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澎湃的欢乐乐章，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更有峰回路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惟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这一切不值得从执政的角度加以总结与反思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令人目不暇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等全新的问题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形成挑战。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进展，中国

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弊端不断被革除的同时，新的问题相伴而生，而且它们不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同时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了。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业问题、腐败问题，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等等。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开拓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但是亦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基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价值日益凸现出来，它先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点题”，继之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响应和讨论，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形成时间短，但其成果就其“短时段”而言却不可谓少，甚至可谓丰富。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大有连篇累牍欲罢不能之势，大家欲在这一新领域有所建树的决心昭然。检视该方面的研究，成就不言而喻，新的领域必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论说内容，它们或者是过去不曾有的，或者是过去没有充分展开的。但是，问题或者缺陷亦明显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深度欠缺，学术含量不够。学术研究应做到“走得进”、“出得来”。所谓走得进，就是要深入材料中，对研究对象有一种深度的身临其境的理解；所谓出得来，就是要能够从材料中跳出来，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站在学术高度和立场上进行客观审视。在这方面，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努力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不够。一些观点和结论显得空泛甚至随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即研究者的结论看上去十分正确，然而你会觉得这种十分正确的结论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就能得出，甚至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也能总结出几条同样正确的结论。这样的研究自然缺乏厚重感、历史感。当然，必须马上指出的是，上述缺陷对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指出上述缺陷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能够完全克服或者避免这些缺陷。这需要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而努力的开始便是对这些缺陷的自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力求做到客观深入,力求做到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具体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问题意识与总体梳理相结合,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上,在吸收已有中共历史和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建树有所突破。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设计的这套丛书包括以下著作,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破茧之初: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

目标设定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往往会存在距离,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或者接近设定的目标,只有等待专家和学者的评判与批评了。这套丛书的总体设计和组稿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的杨凤城教授、王顺生教授、齐鹏飞教授负责。借此机会,也特别向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审稿者和责任编辑致谢,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对丛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杨凤城 记于世纪城

2007年9月17日

自序

记得小时候，我跟舅舅家的两个表弟发生争吵时，他们总是合起伙来说：“这是阿拉的农村，又不是依的。”我的父辈是渔民。尽管农、林、牧、副、渔业都属于大农业的范畴，但他们却从未将我视为农村的小孩，因为我家没有地，没有牛，不春播，不秋收。在他们看来，不是农村的人无法享受他们的乐趣，自然也无法了解他们的生活。当时，我极力反对他们这么地就将我排除在外。自幼，在每年寒暑假，我都跟着母亲去他们家帮着做农活^①，我会他们所会的一切——撒种、拔秧、拢田、割稻、打谷、放牛、打柴……

待到成年，我渐才明白，儿时的谎言确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某种特定的收入分类：农民属于有地没钱的那一类；而那些家里有点存款的基本都不算是农民（至少是“不务正业”的农民）。当时，全国渔业产品价格首先得到放开。这一政策使渔民获得了较大的收入比较优势，生活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捕鱼成了当时农村中令人羡慕的职业，万元户在差不多五年内已是较为普遍了。自那时，我家就购买了农村少有的黑白电视机。数年后，这个东西被我舅舅兴高采烈地搬回家，而我们则换成了一个“带颜色的”。或许正是因为我所生活的渔村跟他们生活的农村在现实上存

①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减粮食压力，中共中央曾提出在南方种双季稻，而有些地区甚至搞起了三季稻。参阅《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因此，浙江农村每年夏季都有“双抢”，即所谓的“抢收抢种”。在这个时期，农村中会出现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因此，大多数农民都会要求那些不在农村生活的、相对闲暇且关系密切的亲戚过去帮忙。

在生活水平的差距,因此,我的两个表弟才会出现了弱势分类的心理。

确实,我并不成长在典型意义的农村,也未能真正地理解它。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我的家乡,渔民迟至 9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搞所谓的“股份制改革”),什么叫“搞副业”。幼时由农村获得的童趣,夹杂着某种学而后知的思考,才逐步转化成如今对农村与农民的一种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丝毫不妨碍我对他们的重新认识与理解。相反,它可以增强许多反索性的内容(reflective content),诸如:缘何农村率先改革的 30 年后,“三农”问题依然成为当代中国最为显著之问题;改革初期,农村与农民的状态是否正如常见的评论那样“自此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是否存在状态上的差异。这里,有太多的提问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因为有太多的“叙述”(narration)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

在业已成为问题的农村与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重新激起同情与思考的同时,人们试图重新去评价当代中国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的过程与效果。然而,有太多的人并不在农村生活,因而也未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农村、理解农民。事实上,他们在“不经意间”接受了那些成效被夸大的“叙述”,并且信以为真(believing it's true),进而引致一种误解性的平衡局面(misreading equilibrium),即历史的“真实”与“被讲述”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构建起来的是政治所需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历史。就如同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说的,“当历史提出一个问题,当累积的焦虑和愤怒最终在人类空间中呈现出一种可辨认的形式时,人们自以为在这之后一切都不同于以前。即使有完整的问题,在其肯定性方面,答案也不可能是答案。更确切地说,是问题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无问题的状态,就像一种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①

现在与过去永远无法割裂。马克·布洛赫曾经强调这样的观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符号》,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8 页。

点,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在;要认识现在,就必须了解真实的过去。而真实地理解过去,必须真实地认识过去的初始状态(original position)。30年前,中国的农村与农民经历了一次史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既迅速改变了农村与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同时又对其未来之命运造成了无可回避的影响。因此,若试图认识当代中国的最显著问题——“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返回历史,去了解改革初期的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30年的历史经验尽管短暂,但是它却依然能够给我们许多答案:是谁提供了30年前农村改革的动力?这一动力是如何被扩展的?由改革获得的动力能否被持续,并且如何能够持续下去?

藉着对那个时期的懵懂体验及日渐累积的反索性思考,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破茧之初”: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然而在论述中,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疑问:这种生活于其间的体验能够使我的认识获得新内容,获得贴近历史的鲜活性,但是否依旧疏漏了许多。并且,这“一增一减”的过程是否意味着我依然无法达到希望达到的目的——完整地、真实地去认识30年前那段历史的面貌?

苏海舟

2010年9月10日

目 录

丛书序言 /1

自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被展现的与未曾展现的“1978年” /30

第一节 国家政治视野中的“1978年”的整体性及其意义 /32

第二节 农村与农民视野中的“1978年”的差异性及其内容 /46

第三节 整体性与差异性的“沟通”:农村改革是
如何发动的? /62

第四节 小结 /82

第二章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 /86

第一节 “运动”过后的农村:政治热情与温饱欲望的
“纠缠” /87

第二节 “保守主义”的勇气:变革环境中的农村与农民 /101

第三节 “茧”丢在哪了:改革初期的遗留问题 /111

第四节 小结 /123

第三章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局部化 与差异性 /126

第一节 自然环境、人口、土地与劳动生产率 /127

第二节 改革意识的启蒙与农民群体行为 /142

第三节 改革进展的特征及其影响 /154

第四节 小结 /166

第四章 1978年前后农村改革局部化的结果 /169

第一节 农村组织性质的变迁及其现代化 /170

第二节 改革过程中的城市与农村的互动关系 /180

第三节 农村改革模式的合理性及其误解 /193

第四节 小结 /198

第五章 真实的“1978年”与被体验的“1978年” /200

第一节 三十年前自我看待的“1978年” /202

第二节 三十年后他者体验的“1978年” /212

第三节 后人如何看待前者的历史 /222

结 论：兼议研究“1978年”的意义 /229

参考资料 /238

后 记 /249

绪 论

历史研究往往要求首先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如何认识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是否存在;其二,如果这种真实确实存在,那么它通过何种方式来被后人体验。很显然,若以现在的篇幅对此作出回答,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但是,如果刻意回避之,则又会陷入类似于埃德蒙德·胡塞尔所说的那种“可以理解的对问题的推移”^①的状态。这种状态将会使历史研究(包括当代史研究)所使用的一切理论与方法“不能作为有效的、可作为开端运用的真理体系,不能作为前提,甚至不能作为假说。”^②

同样,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那就是“历史永远无法离开它的时间性”。从时间维度上说,人们看待历史能够有三个视角(seeing-from to),即站在现在看以前(seeing from now to before)、站在以前看以前(seeing from before to before)、站在以前看现在(seeing from before to now)。前一种视角最为常见,也最容易确立;后两种视角则往往是“虚拟”的,因为它需要将视角中的许多内容略去,而只留下个人感观的成份。在现实中,众多的历史研究著作是基于第一种视角,表

① 胡塞尔在论述“可以理解的对问题的推移”时,提出了一种悖论。他认为,对认识的可能性与切中性的怀疑要求人们放弃自然科学已经确立的一切科学方法。但是在现实中,人们总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证明认识的可能性与切中性。这种悖论实际上与历史研究的过程也是吻合的。当历史真实的前提受到怀疑时,无论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历史研究实际上都处于“可以理解的对问题的推移”的状态。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② 《现象学的观念》,第11页。

现为后人对历史的评价;历史性的档案、文献、新闻报道、回忆录、访谈记录(oral history)等则基于第二种视角,是前人对于他的那段历史的感受与记忆的保留;跨时代的历史回忆与访谈基于第三种视角,特别是对于经历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而言,他对两个历史时期的比较感受,可以反映时代变迁对历史个体所造成的影响。基于此种视角的历史感知虽然是直观的“镜像”(mirror image),但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内容——前人眼中的前代与前人眼中的后代。第一种视角能够较为容易地处于中性立场,而第二、第三种视角则往往掺杂较多的个体(官方的与私人的)评价与情感。但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要认清一段历史或者说要尽可能地体验到历史的“真实”,最好的方式则是将三种视角融合在一起,并由此展现这段历史的“多面性”。^①

一、研究“1978年前后”的意义及其内容

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很自然地,“1978年”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个年份因其强大而宽泛的政治影响力而著称,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符号”(sign)^②。换句话说,“1978年”这个称谓不仅确定了此段历史的时间维度,也涵盖了此段历史的基本内容,诸如“体制变革的意义”、“农村致富的激情”等被概括成这一时期的主题,其他描述性的词汇甚至都无出其

① 西方历史编纂传统奠基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者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看待历史的态度与方式。或者说,两者看到的是历史不同的侧面。“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中所展示的历史面貌,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感受而古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中得到充分体现。”“修昔底德则故意使自己局限于当即或者直接可记忆的经验,摒弃‘神话历史’,并根据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历史进程中与他本人一样的政治、军事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来努力解释事件的发生”。参见[美]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② 按照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解释,“人们以为意义内在于符号,因为每一个符号一旦获得了它的意义,就不能在它的(译文如此,似为‘和’)我们之间塞入任何不透明性,甚至不能引起我们思考:符号也是只有一种提示作用,符号提醒听者必须考虑他的思想中的某种思想。”[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第49—50页。

左右。而在此之后的近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试图从这个年份中获取某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者答案。

改革起步至今的 30 多年间，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历史研究者，他们对于农村改革充满了复杂的情结，既有对改革的崇敬，也有对改革的忧患；既有对改革的赞叹，也有对改革的不满。那么，该如何理解 1978 年前后的中国农村改革初期的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一命题实际上既简单，亦复杂。所谓简单，似乎我们只需要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因素统统考虑进来，就能够对此作出较为全面的回答。所谓复杂，则是说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的因素纠合在一起，彼此影响、相互关联，很难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而且，这些因素发挥影响的过程并不是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其影响并不随着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消逝。

客观上说，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农民由此而激发出来的热情与力量迅速改变了农村长期贫困的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 30 多年后，“三农”问题却成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手中也有“铁饭碗”。虽然只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国家公共保障制度使得农民无需独立承担土地经营的风险，农民享受着国家和集体给予的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而改革之后，农民手中的“铁饭碗”被打破，尽管重新为自己创造了土地自主经营的制度环境，但是他们同样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局面。随着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减少以及原有的公共福利体系的瓦解，农民必须依靠自己承担许多原本不需要承担的压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一方面，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见缩小反见扩大，农村的各项生活条件与设施已经大大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农村内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快。富裕的农民转换身份成了私营企业家、商人或者乡村管理者，并且积累大量的财富与资源。而贫困的农民则成了城市工商业与农村工商业的雇用职工（农民工，或称之为劳工化）。由于农村主体地位的丧失，那些依然属于农民身份的人已经越来越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

无法有组织地进行表达,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总之,当代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已经促使人们重新形成对农村的印象,并且重新思考农村改革30多年后的成败得失:30多年前,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被誉为“伟大创举”,并且成为标志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的一个重大碑式;而30多年后,“三农”问题却日见显著,已经被共识为“可能阻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对照差异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多地看重了这个历史时点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内容;过多地重视了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成效,而忽视了制度改革背后所存在的无效甚至消极成份。

且看两种关于“1978年”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描述:

(1)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报道,并且配发评论员文章:“农民是讲求实际的。只有使农民从切身利益中感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他们才能越来越热爱社会主义,越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集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利益,成为推动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①

此后,官方媒体在评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都大篇幅地使用了“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字样。这一点显然也影响到了西方人对“1978年”的看法。威尔·霍顿(Will Hutton)在他的《墙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中这样写道^②:

自1978年以来,(中国)以类似于美国在独立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崛起的规模和速度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2)在个人自传《从打工仔到亿万富豪》中^③,改革初期的四川农村依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余震中。“改革”在当时农民心目中

① 《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

②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LITTLE, BROWN, 2007, P. 1.

③ 刘延林:《从打工仔到亿万富豪——刘延林自传》,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或许仅仅是一种政治口号：“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都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钱哟！”

《人民日报》报道中 1978 年改革
初期的江苏农村的状态

“这两名外国记者在一个富农家里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当问到她家和华西大队社员的生活水平如何时，这个富农分子扳着指头算了一笔帐：解放前，她家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至多十担稻谷，现在，华西大队的社员，每人每年分配加上集体福利，达到了二百四十一元，相当于二十四担稻谷。这个富农分子不得不承认，如今华西大队社员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富农的收入。集体经济繁荣，社员生活富裕，这是华西大队最引人注目之处。正因为如此，参观过华西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这样的社会主义，社员群众哪个不爱！’”

——《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5 日

一本私人自传中 1978 年改革
初期四川农村的状态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说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都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钱哟！”

——刘延林：《从打工仔到亿万富豪——刘延林自传》

很显然，这两种描述就那段特定的历史而言，都属于“真实”记录，但描述所给出的状况则差异显著。同是作为历史的叙述，后人更多地是接受前者（如西方人眼中的“1978年”），因为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官方权威性。但是，如果没有那些亲历过这个时期的人的真切感受作为比较，我们恐怕就更难想象“权威性”的历史镜像与现实状态的差异。茅盾小说《追求》中的主人公张曼青——一位中国 20

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照理,现代史的材料是报纸,但是中国的报纸,就没有正确的史料价值。”^①事实上,新闻报纸的事实性价值显然要低于它的宣传性价值。其舆论导向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②,而这种阶级性在当代,则表现为强大的政治性。因此,如果我们以带有强大政治性的报道、文献作为认识历史的基本依据,且对此不加以澄清,那么或许将来的考古式研究依然会从类似于前者的官方权威性资料中受到误导。

※

※

※

本书试图呈现一个“真切”的1978年前后的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基本状态。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对“1978年”及其当时农村与农民状态的认识,有太多的内容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我体验的。在本书中,“真切”可能是一个更为恰当的修饰性定语^③。官方叙述下的“1978年”所呈现的状态与个体(农民)感受下的“1978年”都可能是“真实的”。但两者的“真实”之间显然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既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也可能出于对意义的不同理解。

《“破茧之初”: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这一取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用“1978年前后”这一定语来界定研究的时间维度,同时也使之蕴含“改革”初始之际的意思;二是用“破茧之初”来转喻所关注的对象,即将其作为过程来研究,而不是从传统的历史事件的角度入手。形象地说,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发与过程实际上被比喻为“蛹破茧化蝶”——蛹从里面将茧咬破,其所选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橄榄型茧的最薄弱部分。破茧的一刹那,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斑斓的生命的开端。这种转喻方式能够更为形象地表明中国农村的改革既是一个“社会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生物过程”。并且还意味着,我们既应该研究“化蝶”的过程,更

① 茅盾:《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③ “切中”(treffen)在德语中的基本含义是射中、击中。胡塞尔认为,“切中”一词暗示“认识和认识客体的统一性”。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7页。在本书中,“真切”同样暗含了“历史的认识与历史本身的一致性”。